昆明学院学报　2021，43（2）：98～103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历史学】

晚清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文本述要

李艳峰，李　勤，薛雨霞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晚清云南是法国殖民者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有关西南边疆危机处理的众多事项在往来于云南督抚和清廷皇帝之间的奏折中都有记载。这些奏折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西南边疆历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化研究最直接、最重要的文献凭证，其史料价值很高。晚清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散见于多种史籍档册中，很多至今仍以古本存世。

关键词：晚清；中法交涉；云南官员；奏折文本；述要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1）02－0098－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1.02.016

A Study of Memorial Texts from the Officials in Yunnan Province on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Yanfeng，LI Qin，XUE Yuxia
（School of Humanities，Kunming University，Kunming，Yunnan，China　650214）

Abstract：Yun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French colonists to enter China. Many matters related to the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were recorded in the memorials between the major governors of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central emperors. These memorials are numerous，rich in content and of high historical value，and they are the most direct and important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southwest frontier history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memorials are scattered in various historical records，and most of them still exist in ancient books.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officials in Yunnan province；memorial text；summary

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是近代西方恃强而来、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随着在亚洲南部殖民活动的推进，代表当时资本主义体系的殖民强国法国经由越南，在云南与东方古老的清廷中国相接，西南边疆危机随之出现。

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中的中法交涉与当时越南局势密切相关。关于越南，公元10世纪越南借李唐衰落之机逐渐脱离中国行政版图，此后一直是亚洲东部以中国为中心宗藩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而法国和越南之间的政治关系以1784年两国订立《凡尔赛条约》为开端，但是直至80多年后的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年）昏聩暗昧且已自顾不暇的清廷才开始关注法、越关系动向（1870年，同治皇帝听闻法军在越南攻城略地，便晓谕广西巡抚苏凤文“密派干练有识之员，前往该处确访，一切情形绘图贴说，并将近日安南与法国情意是否融洽之处，据实奏闻”。梧州知府徐延旭遂受命潜赴越北谅山一带密查，得知“该国南圻滨海被洋人

收稿日期：2020－11－12
基金项目：2019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晚清中外交涉中云南官员奏折的整理与研究”（YB2019041）。
作者简介：李艳峰（1976—），男，河南新乡人，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西南历史及地方文献研究；李勤（1998—），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云南地方文献研究；薛雨霞（1997—），女，四川达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云南地方文献研究。

占踞六省，衔恨甚深，实无融洽情形”）。[1] 1874 年法越《甲戌和约》(《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和法国殖民者围绕越南属国地位问题展开了长期外交层面的争辩交涉。同时，法国殖民势力在中南半岛不断向北推进，1882 年 4 月法军攻占河内，一系列军事冲突后的 1883 年 12 月中法战争爆发，① 清廷外交层面的“保藩固圉”无奈进展到战争层面的“自固疆圉”。越南北圻成为中法交锋的主要阵地之一，云南则直面法国殖民侵略势力。因为与台湾问题、京畿形势密切关联，云南具有足以影响清廷全盘统治棋局的分量，身处王朝国家视野尽头的云南很快成了清廷决策层不得不放大关注的热点地区。而晚清中法关于开埠通商、国界勘定、边案处理的交涉折冲以及与此有关的中越宗藩关系变化、西南边防海防、边疆治理等内容在往来于云南督抚和清廷皇帝之间的奏折中都有记载。

一、云南官员奏折的基本情况

关于奏折。奏折是清朝臣工直接上呈给皇帝的一种重要官文书，根据具体情况皇帝会在奏折上硃笔批答，是为硃批。硃批奏折在当时具有法律效力和行政效用。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 年）军机处成立，之后军机处将内奏事处送交的奏折登记，并抄录一份留存备查，是为奏折录副制度。录副奏折与原折在内容上一致，也是可靠的档案材料。具奏官员派遣专人或者通过驿站递送是奏折一直以来的传递方式，皇帝谕旨也是一样，但是晚清电报开通，因此又衍生出电奏、电旨这种新形式，并逐步形成了不同于普通奏折的寄递程式与管理制度。晚清大规模架设电报，适逢中法关系因越南问题而日趋紧张，为此清廷进一步开放电奏。例如，清德宗光绪十年（1884 年）七月二十九日，② 光绪皇帝便曾电旨张之洞，使之转谕广西巡抚潘鼎新，与时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就安设滇桂电线一事“立即商办，以速军报”。[2]卷46,31 但就我们爬梳所及，云南官员在这段时间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理而上奏的折本片单没有采用电报形式的，这也反映了晚清官场对于新生事物电报的接受程度。不过，清廷皇帝颁给云南官员的谕旨则多为电旨形式，同时云南官员和中央部院之间就具体相关事项处理产生的各种官文书一般也都是电报发文。

关于具折的云南官员。就清朝奏折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清圣祖康熙以来具奏人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京外的督抚提镇等多级官员都有上折权利。而西南边疆危机处理中，云南官员奏折的具奏人只是各任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主要有刘长佑、杜瑞联、岑毓英、唐炯、崧蕃、魏光焘、王文韶、谭钧培，其他督抚如李经羲、林绍年、沈秉堃等人与中央部院的往来公文则相对较多。另外，云南巡抚唐炯曾因抗法不力被革职，后转任滇省矿务督办一职，其与云南籍京官、时任编修之职的陈荣昌均有少量相关奏折存载。

关于奏折的寻查获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存有清朝奏折原本 72 万 3 千余件，另有录副奏折上百万件，其数量非常可观。[3] 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奏折原本和录副奏折共计 70 余万件，均按照内容分为内政、军务、财政、农业、水利、工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工程、文教、法律、外交、民族事务、宗教事务、天文地理、反清斗争、列强侵略以及综合等共十八个大类，类下设项，各项所系奏折按时间先后编列。由于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理而产生的云南官员奏折主要集中在光绪一朝，所以《光绪朝硃批奏折》一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③ 该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朝汉文硃批奏折原本影印件的汇编，辑录了光绪元年（1875 年）至三十四年（1908 年）间满汉官员所具奏折近 10 万件，大约有 6 000 多万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奏折则陆续以编年体形式原本影印出版。尤其是 1973 年至 1975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①在越南北境，1873 年 12 月中法爆发第一次纸桥之役，1883 年 8 月至 9 月爆发怀德之役和丹凤之役。

②清朝奏折有具折日期和硃批日期二种。因为在应对西南边疆危机过程中云南官员所奏均为军国大事，很多需要清廷皇帝亲自批答指示，本文所言奏折日期均为硃批日期，而非具折日期。并且这里的年月日与现在的公历不同，特此说明。

③该书内容可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硃批奏折》（古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 1996 年。

辑出版了《宫中档光绪朝奏折》,① 收有奏折 1 万 9 千件。两地共有光绪朝奏折原本约 12 万件。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承袭清朝官修史钞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而来的《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故宫博物院另藏有《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一书，记录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 年）至二十八年（1902 年）间之“夷务”。我国台湾学者冯明珠专文梳理比较了该书与《清季外交史料》的关系。她认为《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是清实录馆较早修成后存档的，《清季外交史料》之前一百八十二卷乃复辑前者而成，王彦威仅为重抄者，实非原编］。[4] 作为晚清有关外交方面官方档案的文献汇编，该书由清末民初的王彦威、王亮父子辑编，收载了光绪元年（1875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间有关中外交涉的诸如奏折、谕旨、照会、条约、章程、宣言书等各种档案文件，共 8 千 7 百多件，以编年顺序排列，共 164 册，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由外交史料编纂处将全书出齐。② 《清季外交史料》所收光绪、宣统两朝奏折乃直接复录晚清军机处等官方原档而来，系第一手原始资料。[2]卷首 在整理出版过程中也是精细有加，王氏孙辈王敬立“继承有志”，“竭朝斯夕斯之心力，从事校雠”。[2]跋 但是即便如此，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抄写、校对错误，甚或有故意删改之处。另外，根据前清军机处原档编印的《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以及清代官修《清德宗实录》等也很有参考价值。其中《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为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即后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于该院所藏清军机处档册、折包择采而来，编成二十二卷，1932 年至 1933 年陆续编印出版；共收入光绪元年（1875 年）正月至光绪十年（1884 年）六月间有关中法交涉的谕旨、奏折、电报、照会等 1 076 件。还有，晚清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也散见于云南督抚张凯嵩、岑毓英、谭钧培等相关人物的文集中。本来奏折、谕旨这类官文书保密要求极高、管理甚严，但是官员文集一般由后来者搜罗、抄录，时过境迁，保密性降低，加上晚清官场混乱、纲纪废弛，故能公开得见。

总的来看，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理而出现的云南官员奏折，其原本主要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他们中的一些或以影印方式或以排印方式同时被几种文献载录，编收体例各异。而在编入个人文集时可能会有所讳饰和删节，被收入政书、汇编时又往往被删去日期或改为收折日期。这些都是我们在查寻、整理云南官员奏折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二、奏折内容

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疆土、民族、宗教、外交、经济等方面。下面根据我们翻检所及，对其内容试作梳理分类。③

（一）滇边防务和中法战争

相较而言，这一事类的奏折数量最多，这也是由东方传统王朝国家的“政治品质”所决定的。随着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北境不断推进，出使法俄的

①该书内容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 年 – 1975 年。

②本书收载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间有关中外交往的各种官方档册文书，内容繁富，包括有：“清光绪朝外交史料”二百一十八卷暨卷首，“清宣统朝外交史料”二十四卷，“西巡大事记”十一卷暨卷首，“清季外交年鉴”四卷（卷后有“清代约章分类表”一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十二卷（卷后有“清光宣两朝条约一览表”一卷），以及“边疆划界中日战争图”十六帧，共计二百七十三卷，一百六十四册。

③晚清中法交涉过程中出现的云南官员奏折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奏折、文件虽然主要集中在光绪一朝，但是由于所涉官员较多、内容广泛，又存载于多种历史文献中，编收体例各有不同，其查找、翻检、获取甚为不易。本文对于奏折内容的梳理分类基于我们力所能及的奏折篇目而言，难免会有疏漏，待来日密密补缀。另特别说明：为行文方便，本文所提及的具有代表性的奏折均依据（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

曾纪泽最早发电“总署”，① 指出法国欲占领越南北圻并通商云南的谋算。清德宗光绪七年（1881 年）十月十五日，总署据此奏请“饬南北洋大臣，两广、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密为妥办”。[2]卷26,12 针对法国的殖民意图，光绪八年（1882 年）三月初三，使俄曾纪泽又具折细陈。② 鉴于越南局势日益严峻，之后很快光绪八年（1882 年）三月二十五日光绪皇帝谕令包括当时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在内的各省督抚，“再行通盘筹画，悉心妥议，迅速复奏”。[2]卷27,20 时隔近五个月后的八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又专门降旨晓谕刘长佑、岑毓英、杜瑞联等人“审度机宜，妥慎办理”。[2]卷29,5

光绪八年（1882 年）十月初六，由福建巡抚任上署理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和云南巡抚杜瑞联就法越局势应对，上呈“会筹越边防务”折。③ 仅就我们爬梳翻检相关史籍档册的结果来看，这是云南官员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理而首次具折上奏。此后，针对滇边防务和接下来的中法战争云贵总督岑毓英和几任云南巡抚上呈了数量众多的奏折，光绪皇帝也多有硃批。这一事类的最后一个奏折是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七月初一云贵总督岑毓英所具关于“关外各军及刘永福所部一律撤竣”之事的，另随折附有“滇军阵擒法兵并无存留请与法使理论”的片单，两者均有硃批。④

（二）界务、商务

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大捷之后，清廷在越南北境面临一个较为有利的战场局面，但是受国力限制和整体国际战略环境制约，最终还是接受了停战撤军的结果。而法国殖民者则迅速占领越南北圻，并趁势在滇省进行殖民经济渗透。于是在云南官员上呈皇帝的奏折中，有了关于中法之间界务、商务等方面交涉往来的内容。

1. 界务

近代欧洲主导“民族自决”“主权”“独立”等概念涵盖下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些主张伴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深度影响了全世界，而民族国家首先要有与其行政管辖、主权行使相对应的清晰明确的疆域和边界。与此不同，作为东亚地区传统王朝国家的清廷中国则有疆无界，其与包括越南在内的周边“四夷藩属”之间，虽然存在有历史习惯形成的各自的地域范围，但是在政治统属、军事控制、人员管理、律令实施等方面从思维认知到操作实践均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并不是严格不变的。所以，在占领越南全境、使越南沦为保护国后，法国殖民者与清廷便有了围绕边界勘定而展开的交涉谈判。虽然说这客观上带有促使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色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当时历史境况下的中法边界勘定和谈判无疑更是法国殖民者攫取利益的重要手段。

清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七月二十日，总署具折奏请派员勘定滇越边界。⑤ 此后的光绪十一年（1885 年）十月十八日，云贵总督岑毓英上呈奏折，详陈都竜系云南旧有之地，并请于勘界时酌议收回，“仍以大赌咒河为界，以固疆圉而资扼守之处”。[2]卷61,36－37（该折其名为“片”，当有正折，惜暂未找到）由于主要涉及具体事务性工作，云南官员针对界务问题而上呈皇帝的奏折数量较少，其与总署等中央部院的往来公文则居多。

2. 商务

资本主义法国殖民扩张的重要目的是掠夺生

①“总署”即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 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根据清廷与西方列强所签《辛丑条约》相关款项之规定，又改为外务部。

②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七・使俄曾纪泽奏法人谋占越南北境拟筹办法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有硃批。

③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十・滇督岑毓英等奏会筹越边防务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未见硃批。

④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滇督岑毓英奏关外各军一律撤竣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正折附有“滇军阵擒法兵并无存留请与法使理论”的片单。

⑤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总署奏请派员勘定滇越边界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有硃批。

产原料、占领商品市场，也就是曾纪泽拍发给总署电文中所言之“谋占越南北境”以“通商云南”。[2]卷26,10光绪十一年（1885 年）八月十一日，总署具折奏请派员与法国使者会议“中法滇粤通商章程”，光绪皇帝硃批降旨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全权处理此事。① 云南官员奏折中出现了关于中法在铁路、矿务等商务方面进行交涉谈判的内容。

（1）铁路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闰三月初五，总署上折呈奏了针对法国欲建造滇越铁路的拟对应之策，并附双方照会各一件。② 同年九月初五，云贵总督崧蕃上折具奏法员来滇议修铁路以及双方商办之情形。③ 关于滇越铁路修建，云贵总督崧蕃另有两通奏折。此后多任滇督滇抚如魏光焘、李经羲、林绍年等人与外务部等中央部院有多通相关公文往来。

（2）矿务

关于矿务，早在光绪二年（1876 年）四月十二日，时任云贵总督刘长佑和云南巡抚潘鼎新便有“借款开矿购器铸钱”之折，并附有关于“办矿雇用矿师有五可虑”的片单。④ 光绪十五年（1889 年）四月十九日，滇省矿务督办唐炯上呈“矿务牵涉通商事件敬陈愚虑”的奏折。⑤ 之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二月初五，云贵总督魏光焘又有“法员来滇开办矿务现与议定章程”等奏折，⑥ 以及与中央部院往来的数通相关公文。从中可见法国殖民者对滇地矿产种类、分布、成色等情况都极为熟悉，因为法人所欲开采的“七处矿产实括全省精华”。[2]卷156,3其实在铁路修建等众多方面也是如此。这不仅反映出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膏腴之地的处心积虑，也表现了清廷总体上对于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无知，更见微知著地表明了工业革命之后建立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西方世界与固守封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东方传统王朝国家在文明层次上已经拉开了距离。

（三）其他

此类奏折主要指数量很少、内容独立又细碎且不便归类之篇什，但所涉事项皆颇有可观之处。

越南问题。中法战争结束不久的清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 年）十月初一，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越南国王遣使请锡封颁发国印”之折，并附“请饬商法使退还北圻以存越祀”之片单。⑦ 另光绪十二年（1886 年）二月初二，云贵总督岑毓英等人呈折详陈“法人改立越君并接越臣禀函”之事。[2]卷64,4这些折单记载了中越之间传统朝贡体系下宗藩关系向近现代法约体系下东亚国际关系转变的历史大变革，以及越人首鼠两端、意图在中法两国之间拿捏权衡以取己利的做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日渐没落的清廷对于当时越南吸引力的快速消失。

遣使设领。光绪十五年（1889 年）三月二十五日，岑毓英奏陈“蒙自设关已预筹妥备”一事。[2]卷80,7与此有关的奏折我们暂时仅找到这一个。

关于洋教传播。光绪九年（1883 年）三月初

①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总署奏请派员会议中法滇粤通商章程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

②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一·总署奏法国请租广州湾并建造滇越铁路谨拟办法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有硃批。

③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五·滇督崧蕃奏法员来滇议修铁路谨陈商办情形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有硃批。

④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十·滇督刘长佑等奏借款开矿购器铸钱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附有“滇督刘长佑等奏滇省办矿雇用矿师有五可虑”的片单。均有硃批。

⑤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滇矿务督办唐炯奏矿务牵涉通商事件敬陈愚虑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有硃批。

⑥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三·滇督魏光焘奏法员来滇开办矿务现与议定章程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有硃批。

⑦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滇督岑毓英奏越南国王遣使请锡封颁发国印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未见硃批。附有“滇督岑毓英奏请饬商法使退还北圻以存越祀片”，此片单有硃批。

八，有“着岑毓英及早妥办浪穹县教案”的上谕，其中提及“岑毓英奏参不能保护教民之知县、汛弁，请旨暂行革职”一折，[2]卷32,6惜暂未找到此奏折。

还有，光绪十六年（1890 年）十一月十二日，云贵总督王文韶、云南巡抚谭钧培上奏“法人遵约归我逃人”之折。①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六月初五，滇籍京官、时任编修之职的陈荣昌及公车一众有“奏请拒绝法国要求割让普洱蒙自以保边圉”的折子。②

三、余论

晚清随着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不断向北推进，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出现危机。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理而产生的云南官员奏折数量众多、涉及内容广泛，另有总署、直督、粤督、桂抚以及驻法公使所具与此直接相关的奏折、其他公文约百篇以上，他们共同记录了近代清廷应对西南边疆危机的全过程，是西南边疆历史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化研究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清宣宗道光以来“夷务”“边务”之“办理得失全在奏章”（见赵昀《遂翁自订年谱·咸丰元年》，清德宗光绪年间刻本），所以其史料价值很高。这些奏折记录了宏阔历史背景下清廷高层西南边疆治理策略措施的变化调整及其对外传统观念、心态受到的巨大冲击，记录了“华夷天下”体系崩溃、古老中国开始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艰难历程，并对后来中国西南疆界形成、民族人口分布以及中国与法越关系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深入把握当时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进程和中国朝野状况的基础上，对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进行全面搜集、深度整理和综合研究很有意义。首先，经过搜集、整理的奏折及相关公文辑稿可以拓宽相关研究的视域广度，为历史学、民族学、边疆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可信、便捷的文本资料，有助于中国边疆治理文献整理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和相关领域创新成果的取得。其次，对奏折中有关晚清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内容的研究，可以还原清廷处理西南边疆危机的历史真实，可以追寻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从而有助于揭示清廷对于世界大势虽有触动但仍不断错失革新和发展机遇的历史及思想观念根源，有助于探讨曾经引领世界的中华文明到了近代却在层次上落后于人的深层原因。时至今日，发展与亚洲南部各国关系、维护西南边疆稳定、促进当地社会发展仍是我国新时代国家建设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之际尤其如此；我们相信对于晚清中法交涉中云南官员奏折进行深入研究，也将会对此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政策参考。

另外，在法国于中南半岛东部向北推进的同时，英国殖民者则从印度向东，经缅甸进入云南，与法国一起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殖民掠夺，这自然也是中国西南边疆危机的重要内容。为应对滇西南缅甸方向的多种危机，也出现了大量往来于云南官员与清廷皇帝之间的奏折等官文书。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

［参考文献］

［1］清实录·穆宗实录（六）：卷 287［M］. 北京：中华书局，1987：973，974.

［2］清季外交史料［M］. 王彦威，辑，王亮，编. 北京：外交史料编纂处，1935.

［3］朱金甫. 清代奏折制度考源及其他［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2）：10－19.

［4］冯明珠. 再论《清季外交史料》原纂者：兼介台北故宫所藏《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G］//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上册.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45－159.

①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三·滇督王文韶等奏法人遵约归我逃人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有硃批。

②奏折内容可见（清）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六·编修陈荣昌及公车等奏请拒绝法国要求割让普洱蒙自以保边圉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出版发行），民国 24 年（1935 年）。该折由都察院代奏，未见硃批。